

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 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

郭声波 刘兴亮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 槟榔是我国传统的药材及嗜好品,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和嚼食史, 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我国槟榔种植格局, 槟榔习俗文化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 槟榔的制作、嚼食方法及销售方向, 槟榔礼俗的衰减四个方面作了进一步探讨, 希望有助于学界对槟榔栽培与槟榔习俗文化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槟榔 槟榔种植 槟榔习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09)04-0005-11

[收稿日期] 2008-11-25

[作者简介] 郭声波(1959—), 男, 四川泸州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文献。

槟榔不仅是我国南方传统的中药材和居民日常嗜好品, 而且还是古代婚丧嫁娶等习俗中的重要载体, 形成了范围较广、独具特色的槟榔习俗文化。国内学术界对槟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槟榔礼俗探源、槟榔药用价值方面, 而在槟榔种植格局、槟榔习俗的空间分布、槟榔制作加工、槟榔贸易方向等方面尚属薄弱^①。本文拟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不当之处, 请方家指正。

一 槟榔种植格局

中国槟榔有10多种, 其中几种有栽培经济价值。

其一曰马槟榔(Capparis masaikai Levl. 白花菜科山柑属), 为木质藤本植物。《滇南本草》曰: “马槟榔, 即马金囊、水槟榔。其仁有纹, 盘旋似太极图, 又名太极子。”^②《滇海虞衡志》云: “槟榔有数种, 滇南所生惟壳槟榔, 穿之成

串, 以相遗, 但半壳细剥, 壳裹以灰食之。然非树生, 乃出藤本, 藤缘崖行, 实累累相悬, 为槟榔弟。……今壳槟榔出于藤, 其藤大抵扶留之别种, 其实气味颇似槟榔, 故以壳槟榔名之, 实非槟榔。”自注云: “藤生为马槟榔。”^③由于树本槟榔稀少, 这种藤本槟榔成为当地居民的槟榔替代品。据记载, 明清时期, 在云南开化府、永昌府、元江府、丽江府, 广西庆远府、潯州府等地均产马槟榔。

①刘正刚等:《清代台湾嚼食槟榔习俗探析》,《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四达:《闽台槟榔礼俗源流略考》,《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司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槟榔礼俗源流考略——兼论晚清槟榔在此地区的多种用途》,《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陈重明等:《槟榔的民族植物学》,《植物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1期第3卷;杨秋:《东莞槟榔歌的缘起、功能及其民俗意义》,《岭南文史》,2003年第2期等。

②[明]兰茂:《滇南本草》,(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684页。

③[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0《志果》。

其二曰山槟榔 (Pinanga discolor Burret. 棕榈科山槟榔属)。竺法真《罗山疏》曰:“山槟榔一名蒟子,生日南,树似栟榈而小,与槟榔同状。”^①《太平御览》亦云山槟榔“干似蔗,叶似柞,一藜十余干,每干生十房,房底数百子,四月采。树似棕榈,五月子熟,长寸余”^②。主要生长在广东罗浮山地区(海南岛亦有),形状比普通槟榔要小,故有史书称它为“槟榔孙”。此种槟榔并不多见,产量也不多,当地居民取其叶子作织布用。

其三曰槟榔 (Arecaceae L. 棕榈科槟榔属),即大腹槟榔,又有仁频、宾门、洗樟脑、青仔、大肚子等名,多见于海南岛及台湾岛。晋陶弘景说:“向阳曰槟榔,向阴曰大腹。”宋周去非曰:“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肚子。”^③明李时珍则云:“大肚子出岭表、滇南,即槟榔中一种腹大形扁,而味涩者,不似槟榔尖长味良耳,所谓猪槟榔是矣。……大腹以名,所别鸡心槟榔也。”^④清黄叔璥讲得更详细:“枣子槟榔,即广东鸡心,俟熟取子而食,台人于未熟食其青皮,细嚼,麻缕相属,即大腹皮也,中心水少许,尚未成粒,间有大者,剖视其实,与鸡心无二。或云粤人食子,台人食皮。”^⑤《本草经疏》亦说:“大腹皮,即槟榔皮也。”这说明鸡心槟榔、大腹皮为槟榔的成熟种子和果皮,因各地嚼食槟榔的喜好不同而名称亦有所不同,但两者在药性方面有差别。除海南和台湾外,在云南的元江地区,广西的东南部少数地区亦有大腹槟榔种植。

总之,就槟榔种植范围看,大腹槟榔为我国最主要的槟榔品种,集中于海南和台湾两岛;马槟榔为云南和广西两地的特产;而山槟榔的生长区域多在广东罗浮山附近,影响较小。本文所言槟榔,主要就是大腹槟榔和马槟榔两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槟榔种植史。据史书记载,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从南越移植各种奇花异草,种植于上林苑的扶荔宫中,这其中便有槟榔上百本^⑥。但槟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难以适应北方干燥、低温的气候,在黄河以北地区种植槟榔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实际上,我国历史上的槟榔种植区主要分布于北回归线附近(如表1、图1)。具体来说,海

南的槟榔多种植于沿海,台湾的槟榔大部分集中在岛西部海岸边上,雷州半岛、云南元江地区、广西南部的局部地方亦有为数不多的槟榔种植。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槟榔的习性密切相关,《齐民要术》曰:槟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⑦。曾昭璇先生也说:“它(槟榔)是赤道雨林中的树种,即怕风、怕冷、怕旱,……我国唯一的产地即在海南岛的一些局部地区,因为西双版纳有寒潮袭击,台湾风害和温度也不足,……因此,在海南岛从地带性规律是不宜种植赤道雨林树种槟榔的。但是,在热带雨林中都可利用地区性即局部地形环境的调节,找到多湿、高温、静风地点来栽培的。”^⑧正因为如此,宋代以前,我国的槟榔产量不多,品质较劣,上层人士消费的槟榔多由东南亚藩属国家进贡而来。琼州府(海南)进贡槟榔始于宋代,数量并不多(仅为1000颗)^⑨,而占城国向宋朝进贡的槟榔数量则达到1500斤^⑩。鉴于我国槟榔种植范围不广而槟榔需求量大,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国内还需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槟榔。

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槟榔种植地,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海南岛何时开始栽培槟榔虽然无从考证,但如上引证,琼州府于宋代就已开始向朝廷进贡槟榔。据《岭外代答》记载,海南岛最初的槟榔种植集中五指山附近,种植规模比较大,黎族居民获利良多。从各地来岛上贩运槟榔的商人络绎不绝,广州官司每年所收槟榔税就达数万缗^⑪。到明代,海南岛的槟榔种植范围已从五指山向四周扩展,如琼州府每年额贡槟榔为105斤,由琼山、澄迈、临高、定安和文昌5县分派,单

①[明] 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偻》卷8引。

②[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971《果部八》。

③[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花木门》。

④[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1《果部·夷果》。

⑤[清]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3《赤嵌笔谈》。

⑥[清] 毕沅校注:《三辅黄图》卷3。

⑦[北魏]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0《槃果瓜茹》。

⑧曾昭璇等:《海南岛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00页。

⑨[宋]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东路》。

⑩[元] 脱脱:《宋史》卷489《外国五·占城》。

⑪[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花木门》。

表 1 历史时期槟榔种植分布

| 种 类 | 分 布 区 | 槟榔种植区 | 文献出处 |
|------------------|-------------|---|--|
| 大 腹 槟 榔 | 广西 | 郁林州（玉林） | 《粤西诗载》卷 20 |
| | | 邕宁县（南宁） | 民国《邕宁县志》卷 19 |
| | 云南 | 元江县、新平县等地 | 民国《元江志稿》卷 7 |
| | | 昆明县 | 光绪《昆明县志》卷 2 广东、 |
| | 广东 海南 | 琼州府，包括琼山（海口）、定安、澄迈、临高、文昌、会同和乐会县（琼海）、昌化和感恩（东方）、崖州（三亚）、陵水、儋州、万州（万宁） |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道光《广东通志》卷 168、乾隆《琼州府志》及海南各县方志等 |
| | | 遂溪县 | 康熙《遂溪县志》卷 1 |
| | | 海康县（雷州） | 嘉庆《海康县志》卷 1 |
| | 台湾 | 诸罗县（属嘉义）、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恒春县（屏山）、淡水厅（台北）及宜兰县 | 康熙《台湾县志》、康熙《台湾府志三种》、《台海见闻录》、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及台湾各县方志等 |
| | 马 槟 榔 | 广西 | 浔州府（贵港） |
| 庆远府（河池） | | | 乾隆《庆远府志》卷 5 |
| 云南 | | 临安府（红河州），元江军民府，永昌军民府（保山），广南府（文山州东部） | 《明一统志》卷 86、卷 87、《滇略》卷 3，万历《云南通志》卷 4，天启《滇志》卷 2，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 2，《本草纲目》卷 31 等 |
| | | 开化府（文山州南部） | 乾隆《云南通志》卷 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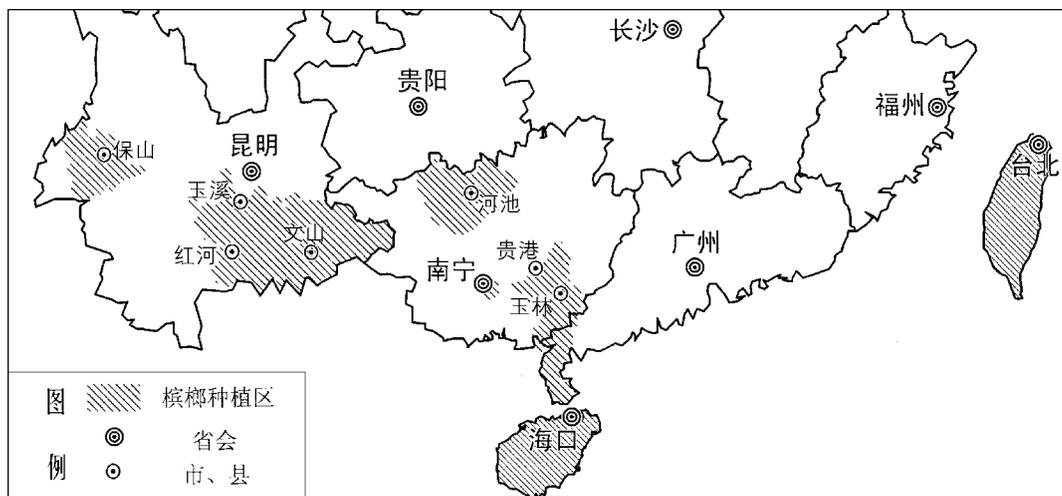


图 1 历史时期中国槟榔种植分布区

是琼山县的摊派数额就达 374 斤^①。上述 5 个县均在本岛东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各州县并无槟榔摊派。随着槟榔需求量的不断上涨，海南岛的

槟榔种植在清代已经遍布全岛，种植槟榔成为岛

①《大明一统志》卷 82《琼州府》条。

上居民的首选,甚至到了“以槟榔为命”的地步。槟榔产量大幅度增加,除了销往国内各地外,约有7/10的槟榔都售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就海南岛内槟榔种植格局而言,由于“东界地瘠,以羊骨雍田,终无获,腴壤多在西”,故槟榔种植集中在不能多产粮食的东路,所谓“东路槟榔,西路米粮”^①。特别是定安县南部的岭门、船埠、石壁以及乐会县一带,所产槟榔最多。除了各家各户自行种植外,民国时期还有专门的实业公司来经营槟榔产业。由于岛内各地地理环境不一,槟榔品质亦有优劣,琼州东南的会同和乐会所产槟榔最好,尤以乐会白石岭出产的槟榔最为有名,价格昂贵。崖县所产的槟榔品质较差,价格较为低廉。定安、乐会、万宁和崖县等地生产的槟榔主要用以出口,其它各县种植的槟榔只供自家使用或在本地销售^②。

台湾的槟榔种植,曾昭璇先生认为是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时传入的,而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定台湾先民引种槟榔已有2500年的历史^③。笔者以为,台湾野生槟榔可能很早就有,但人工栽培槟榔和明末清初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的移民密切相关,大量移民涌入台湾的同时,嚼食槟榔的习俗随之带入,槟榔需求量相应增加,刺激了岛民种植槟榔的热情。如,康熙时期的诸罗县,“舍前后左右多植槟榔,新港、萧垵、麻豆、目加溜湾四社为最。……汉人近亦广植之,射利而已。有至崇爻者(在今台东县),言各社之植尤盛”^④。这说明,移民看到土著民种植槟榔有利可图,便纷纷效仿,致使槟榔种植规模发展较快。清代台湾槟榔的种植以北路最为兴盛,其次为南路,由于台中槟榔的需求量很大,因而台中地区成为槟榔交易的中心^⑤。然而,在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岛的槟榔种植业遭到巨大浩劫,当局曾一度使用严厉手段禁止嚼食槟榔,并强制砍除槟榔树,用以戒除嚼食槟榔的“恶习”。台湾光复后,民国政府对此并不给予限制,嚼食槟榔者逐渐增多,种植槟榔开始恢复。如云林县,在光复后的十多年里,平均每年生产槟榔35000多公斤。云林县的槟榔小贩的槟榔刀被喻为容易赚钱的“三把刀”之一^⑥。当局政府的政策改变了岛内槟榔种植格局,种植重心由北路转到中南部,如北部的基隆市,甚至嚼食槟榔

习俗已经断绝,由于后来中南部人来基隆谋生者逐渐增多,将嚼食槟榔的风习带入,才使得槟榔小摊充斥街道^⑦。尽管台湾槟榔种植规模较大,但它对大陆居民的槟榔习俗影响不大。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我国的槟榔种植主要集中在海南岛和台湾岛,在两广和云南有少量栽培。在这些地区,民间嚼食槟榔成为可能,因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槟榔习俗文化。

二 槟榔习俗的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

槟榔具有杀虫、消食、除痰等功用,药用价值突出,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被喻为“瘴疠之地”的岭南地区的居民对槟榔尤为重视,它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在婚丧嫁娶礼俗中,还是在社会交际方面,槟榔均为待人接物的贵重物品。因此,历史时期的岭南地区甚至是湖南、福建等地,嚼食槟榔成为一种时尚。

我国嚼食槟榔的历史较早,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记载了槟榔的嚼食方法,即将槟榔杂古贲灰、扶留藤嚼食^⑧。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亦云:交广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这说明,最晚到晋代,岭南地区就已开始嚼食槟榔。笔者认为,嚼食槟榔的习俗快速传播当在宋代,如宋代的广州城,“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福建的泉州、广南西路和云南等地,嚼食槟榔的习气亦相当兴盛^⑨。明代,槟榔习俗从广东逐步向外扩展,东至福建省的泉州府、漳州府,西达广西的桂林府、浔州府(贵港市)、柳州

① 雍正《广东通志》卷92《舆地略》。

② [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册35《物产五》。

③ 陈良秋:《我国引种槟榔的时间及其它》,《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7年第2期。

④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⑤ 康熙《台湾县志》卷1《舆地》。

⑥ [民国]《云林县志稿》卷4《经济志》。

⑦ [民国]《基隆市志》之《风俗篇》。

⑧ [汉]杨孚:《异物志》。

⑨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食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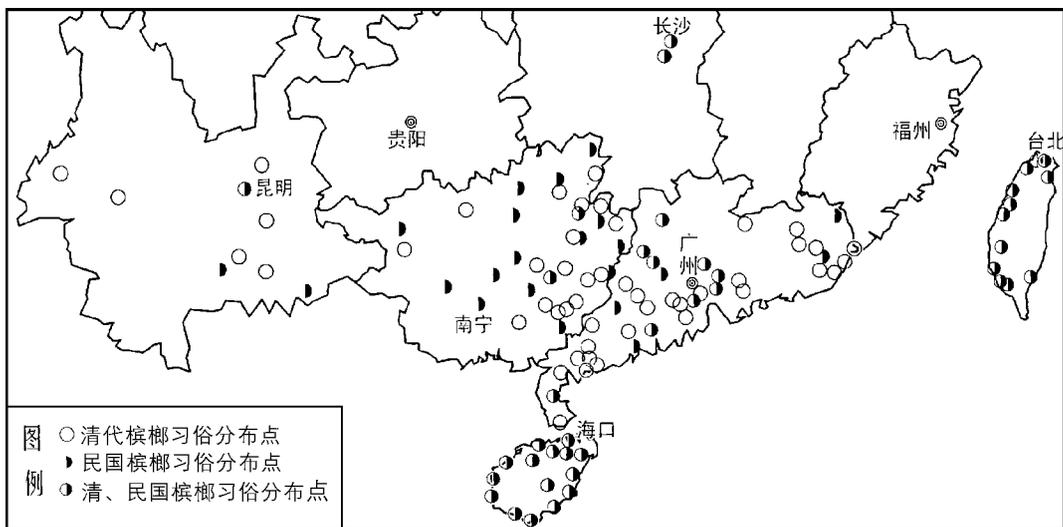


图2 清代、民国槟榔习俗分布

府^①，甚至是云南元江地区也有槟榔习俗，“其地多瘴疠，山谷产槟榔。男女旦暮以葵叶、蛤灰纳其中而食之，谓可以化食御瘴。凡遇亲友及往来宾客，辄奉啖之，以礼之敬”^②。再如广东之廉州府，“不论男女，率挟槟榔而行，交会约婚以槟榔为礼”。槟榔习俗之盛可见一斑^③。

到了清代，不仅在岭南地区有槟榔习俗，湖南省的长沙、湘潭等地已有咀嚼槟榔的习俗。更有甚者，在京城，“士大夫往往耽之”，“竟日细嚼，唇摇齿转”。^④《红楼梦》第64回写道：“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尝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由此可见，槟榔俨然成为大都会贵族时尚嗜好品。

从槟榔习俗的空间分布上看，宋明时期嚼食槟榔风气盛行的泉州、漳州，已不见被记载。同时，随着大批闽粤移民涌入台湾，台湾岛咀嚼槟榔之风日渐兴盛。具体而言，广东槟榔习俗分布点多集中于广州府、肇庆府和琼州府，北部的韶州府和东部的惠州府相对较少。广西省南部槟榔习俗分布点要远比北部多，西北地区最少。云南的槟榔习俗比较集中，即在滇南的元江、临安府、广南府及西部的永昌府和腾越厅，其它地方则较稀少。从槟榔习俗的时间分布看，清代的槟榔习俗分布点最多，而民国时期的槟榔分布点要比清代少，这也反应出槟榔习俗呈现明显衰弱趋势。今据广东、广西、云南、台湾等省方志资料

制成《清代、民国槟榔习俗分布》示意图（图2）。

造成槟榔习俗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可有以下几点：

第一，获取槟榔种的难易程度影响槟榔习俗空间分布。从图2可看出，远离槟榔种植区的习俗分布点明显要少，如粤北地区的韶州府有槟榔习俗的地方就比广州府少，而像肇庆府、云南的元江靠近槟榔种植区，易获取所需之槟榔，槟榔习俗较为兴盛，分布点更为密集。远距离的运输槟榔必然会抬高槟榔成本，远离槟榔种植区的地方需付出更高价格才能获得所需槟榔，因此，槟榔的珍贵程度相应提高。在槟榔价格昂贵时，不少地方的居民纷纷寻找槟榔替代品，如恩平县产红藤，“取其茎合葵叶食之，虽不如槟榔而唇齿鲜红，土人以槟榔价踊，取以代食”^⑤。马槟榔并非槟榔，在云南和广西地区不少地区亦是槟榔替代品，这也是民国时期云南省槟榔习俗衰减的原因之一。

第二，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影响槟榔习俗的传播。广西产槟榔较少，但槟榔习俗几乎遍及全省，究其原因，交通条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

①弘治《八闽通志》卷3《地理》，嘉靖《广西通志》卷17《风俗》。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元江府》。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

④[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7“槟榔”条。

⑤乾隆《恩平县志》卷1《风俗》。

广西东、南部靠近高州、雷州和广州，槟榔可从3条交通要道运抵广西，即廉州——南宁，广州——梧州，高雷——郁林，广西北部的桂林府和柳州府可从肇庆府等地输入。再如，靠近海南的广东阳江县，当地居民到海南岛采买槟榔，几天之内就可往还，获息数倍，“营生居民多食其余利，今（康熙年间）海禁初开，添设关部抽税，船只往来甚少，熙攘之风不可复观矣”^①。关卡林立，槟榔贸易受阻，不利于槟榔习俗的传播。

第三，人口的流动加速和刺激了槟榔习俗的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闽粤移民对台湾槟榔文化的影响。此外，槟榔商贩的流动可刺激槟榔习俗的传播。湖南长沙、湘潭人嚼食槟榔始于清中后期，嘉庆《湘潭县志》记载，槟榔为广商在湘潭的大宗货物，广商的槟榔铺“五步一桌子卖之，合面相向，计每桌日得百钱之利”^②。大量槟榔商贩的涌入，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湖南嚼食槟榔习俗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再者，前引《两般秋雨庵随笔》卷7记载，在京城为官的南海人程京，入京之后，咀嚼槟榔之习不辍，在上朝途中的轿中“端坐吃槟榔”。受这些流动人员的影响，咀嚼槟榔在京师逐渐传播，“京师人亦嗜此品，……竟日细嚼，唇摇齿转”，引来保守派士大夫的阵阵非议。

从微观角度看，我国各地的槟榔礼俗还是有差异的。试以清代为例，我国各地的槟榔习俗按其用途可分为婚礼上的槟榔习俗、丧礼上的槟榔习俗和社会礼节、交际上的槟榔三个主要的方面。

1. 婚礼中的槟榔习俗

古有吉、宾、婚、丧四礼，婚礼即为其一。把槟榔运用于婚礼，主要是因为槟榔包含着特殊的含义，“槟字从宾，榔字从郎，言女宾于郎之义也”，寓意夫妻相敬如宾。而嚼食槟榔的调料——葵叶，同样饱含寓意，“葵与槟榔，有夫妻相须之象。……葵为夫，槟榔为妇。葵字从串从女，男串于女之义也”^③。所以，槟榔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的载体，几乎所有有槟榔习俗分布的地方都把槟榔运用于婚礼中。如澄迈县，“婚姻必择门户，专用槟榔，槟榔数以千万计，至有以金银为蒂者”^④。在槟榔的用量上各地也不尽相同，槟榔产地的琼州府“以槟榔之多寡为

辞”^⑤，而在粤北及广西地区则不然，问名、纳彩等礼节只用少量槟榔。再如，古代婚俗有六礼，有的地方六礼皆用槟榔，多数地方只是把槟榔当聘礼用。

2. 丧礼中的槟榔习俗

此习俗在我国并不多见，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广西的柳州府、桂州府，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尤其是在云南较为常见^⑥。明代中后期，云南风俗崇尚奢华，凡有丧事，凭吊之人皆乐意参加丧礼，因为主人不仅会设宴款待，而且要重金酬赠凭吊客人，以致糜费甚多，更出现因为缺钱以致停丧的恶劣现象。隆庆时，云南按察使徐棫鉴于滇中“丧礼尚奢，在在皆然”^⑦，故“创行条鞭，正婚丧之节，婚勿论则，丧勿用酒，以槟榔应吊客，劝民禁杀。种种皆切于要领，其法至今守之”^⑧。条例颁行之后，用槟榔款待客人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如建水州，“殡俭，……惟宴待吊客，继以酬赠，糜费甚多，近日止用槟榔及巾扇，似近简朴，可免停柩不举之虞”^⑨。因此，槟榔在云南成了简朴、节约的象征，广受欢迎。

3. 社交中的槟榔习俗

药用价值高的槟榔有着较高的地位，在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情感以及社会交际活动中都成为重要礼品。朋友见面，即互相馈赠槟榔，以示尊敬；客人来访，即以槟榔代茶，来表达对客人的敬重。不仅如此，它还是调解邻里纷争的媒介物，广东广州府、肇庆府以及广西、云南少数地方有此习惯。在增城县，“且乡里有争执，求人

① 康熙《阳江县志》卷1《风俗》。

② 嘉庆《湘潭县志》卷10《货殖》。

③ 光绪《镇平县志》卷4《礼俗》。

④ 康熙《澄迈县志》卷1《风俗》。

⑤ [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⑥ 康熙《灌阳县志》卷1《风俗》、嘉庆《临桂县志》卷12《风俗》、乾隆《弥勒州志》卷8《风俗》、乾隆《白盐井志》卷1《风俗》、嘉庆《阿迷州志》卷6《风俗》、康熙《建水州志》卷6《风俗》、光绪《腾越州志》卷3《风俗》、道光《电白县志》卷4《风俗》、乾隆《化州志》卷1《风俗》、乾隆《南澳志》卷10《物产》、康熙《长乐县志》卷7《风俗》等。

⑦ 天启《滇志》卷3《风俗》。

⑧ 天启《滇志》卷10《官师志》。

⑨ 康熙《建水州志》卷6《风俗》等。

曲直者，亦皆献以槟榔”^①。而在台湾岛尤为突出，各地移民的涌入，相互之间或者与土著之间难免会发生纷争，槟榔所被赋予的特殊含义使得它很好的充当了“化干戈为玉帛”的角色。如在诸罗县，“闾里雀角或相谗，其大者亲邻置酒解之，小者辄用槟榔，百文之费，而息两氏一朝之忿”^②，以致有“解纷惟有送槟榔”之说。这也说明槟榔在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一定的功效。

其实，槟榔还有不少特殊功用。在广西的灵川县，凡来参加象征男子成年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时，都要用竹叶裹槟榔为礼，以表祝贺，受礼之人则“籍以袖而受之”^③。在海南，人们在祭祀二伏波将军时，亦将槟榔陈于神像前，供神灵享用，以示敬重^④，这也显示出槟榔功用的多样性。

槟榔文化不仅表现在槟榔习俗上，以槟榔为题材的诗词篇章、民歌民谣以及在槟榔传播过程中遗留下的地名痕迹，也是槟榔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槟榔诗早在宋代就被人们用来营建岭南意象。如李纲有云：

疏林苍海上，结实已累累。烟湿赭虬卵，风摇翠羽旗。飞翔金鸞鷲，掩映箬龙儿。溼落哈椰子，匀圆讶荔支。当茶销瘴速，如酒醉人迟。萋叶偏相称，羸灰亦谩为。乍餐颜愧渥，频嚼齿愁疲。饮啄随风土，端忧化岛夷。^⑤

诗人担忧嚼了槟榔就会变成岛夷，固然是夸张，但南国风土离不开椰子、荔支、槟榔却是事实，槟榔当茶以销瘴病，成为居住在岭南的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嗜食习俗。

清初广东有竹枝词曰：“妾家溪口小回塘，茅屋藤扉砺粉墙。记取榕荫最深处，闲时来过吃槟榔。”^⑥ 东莞槟榔儿歌：“月光光，照地塘。年册晚，买槟榔。槟榔香，买子姜。”^⑦ 可见休闲时吟唱的民歌民谣也是深入人心的槟榔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外，与槟榔有关的地名也屡见于图籍，如云南腾越有槟榔江，临安府亏容土司有槟榔渡，师宗有一个村庄名叫槟榔村，还有槟榔洞。海南岛有槟榔水，文昌有槟榔埔，万州有槟榔浦。台

湾淡水附近有槟榔林。广东归善县东北有槟榔潭。广州在清代槟榔贸易繁荣，大批从海南和南亚诸国运来的水果来此贸易，当时就有一条用于交易槟榔等水果的街道被称作“槟榔街”^⑧。

清道光年间，番禺人赵古农曾将历史时期有关槟榔的史料收集起来，编撰成《槟榔谱》一书，为后人研究槟榔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异彩纷呈的槟榔文化，成为岭南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至今仍熠熠发光。

三 槟榔的制作、嚼食方法与民国的槟榔贸易

槟榔不仅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嗜好品，就好比现在人吸食香烟。像广州人，“不拘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惟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瞰，夜则置盘枕边，觉而瞰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而在槟榔种植区，嚼食槟榔之风就更盛了。嚼食新鲜槟榔时，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即萋叶（或称扶留藤）和牡蛎灰（亦称作古贲灰）（如图3），在没有牡蛎的地方就用石灰，没有萋叶的就用萋藤。在具体食法上略有差异，广州人嚼食槟榔除加萋叶和牡蛎灰外，还添加丁香、桂花、三赖子（山奈）等香药，称之为香药槟榔^⑨。海南岛上的居民又喜欢将槟榔与椰心一并咀嚼，有竹枝词为证：“莫道槟榔甘液好，买依椰子更心甜。”说的就是椰子和槟榔一块嚼食的妙处^⑩。而在儋州，嚼食槟榔时又加入由荔枝嫩叶捣成的茶饼，味道极其鲜美

①[民国]《增城县志》卷1《风俗》。

②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③[民国]《灵川县志》卷4《礼俗》。

④[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⑤[宋] 李纲：《槟榔》，《梁溪集》卷24。

⑥[清]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5。

⑦李炳球：《东莞歌谣辑录》，《东莞文史》，第31期。

⑧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De Souza & Co, hongkong, 1875.

⑨[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食用门》

⑩[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图3 海南琼中县街头的槟榔摊
(摊主正在用萎叶包牡蛎灰)

要使槟榔既容易储存、又符合各地嚼食者不同的口味，在槟榔制作上就要花费不少心思。明代法制槟榔的方法是：将槟榔鸡心者切作细块，加以缩砂仁、白豆蔻仁、丁香、粉甘草、橘皮、生姜、盐，用河水两碗浸一宿，再用慢火于银石器中煮干，焙干，入瓷瓶收。每用细嚼，治酒食过度，胸膈膨满，口吐清水，一切积聚^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详细记载了清代人的制作方法及嚼食喜好：

实未熟者曰槟榔青，青皮壳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琼人最嗜之。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干焦连壳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以盐渍者曰槟榔卤，则广州、肇庆人嗜之。日暴既干，心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当食时，咸者直削成瓣，干者横剪为钱，包以扶留，结为方胜。或如芙蓉之并跗，或效蛱蝶之交翻，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贵粉。

民国时期的槟榔制作也很有讲究。将采摘而来的槟榔用铁镬煮熟后捞出，滤去水分，放入焙灶中烘烤，经30多小时之久，见槟榔皮有光黑色即可取出，按其优劣分成3个等级，1等级为破玉，破玉又可分为枣玉、赤玉和白玉3个级

别，2等共分10级，3等可分成5级。为方便买卖双方记住等级，商家都会将等级数用对联写出，如2等的联子为“隆思昌北阙，盛德庆西宸”之类。枣玉每担可值银50元，赤玉20元，白玉15元，其它等级依次递减，价格也相差不大。分开等级后，即用蓆进行包装，约3000颗左右为一包，另外还要加上补充数目，但实际数目可能要达到3300颗左右^③。然后再投入市场进行交易。

湖南湘潭嚼食槟榔的方法比较特别。由于当地不产槟榔，人们将从岭南运来的槟榔进行熟制，这样才能保存较长时间。最原始的一种嚼法是将熟制槟榔拌以芝麻、桂子油（如图4），这种槟榔一般是很嫩的，不会醉人。而嗜好吃槟榔的人，要嚼醉性很强的槟榔，嚼过之后就像是喝了酒一样，那种槟榔里面都会加很多卤水。他们都不用萎叶、牡蛎灰。



图4 湖南湘潭集市上的芝麻、桂子油拌槟榔

槟榔在我国南方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槟榔的交易量也很大，覆盖面很广，不仅在国内各省进行交易，还涉及到了进出口贸易。试举晚清民国的槟榔交易为例，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记载，有进出口槟榔交易的关口就有30多个，范围遍及今辽宁、天津、河南、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四川、

①道光《琼州府志》卷5《物产》。

②[明]宋诩：《岐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

③国立广东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第4部《海南·琼崖各县农业调查报告书》，1925年印本，第470页。

湖南、湖北、江西及整个岭南地区（见图5）。1905年，我国槟榔总进口数为60631公担，由香港（48341公担）、澳门（11983公担）、新加坡（167公担）及英属印度（229公担）输入，如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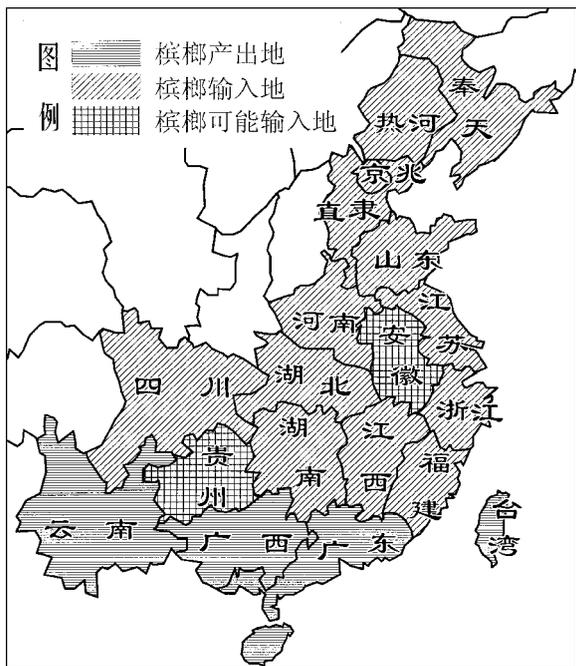


图5 晚清民国槟榔生产与输出地

总的说来，国内各关的槟榔多从香港和澳门进口，其总和为各关直接从国外进口槟榔数的

160多倍。国内诸关进口槟榔方面，珠江三角洲共计进口槟榔28481公担，为全国之最。天津、汉口、牛庄和重庆进口数也比较大，其它地方则很少。这大致也可反映出各地对槟榔需求的多寡。当然，其中也有特殊情况，像广州关，虽说从港澳等地进口槟榔多达4689公担，但该关同时又向内地关口出口槟榔1823公担，向香港出口37公担，广州关实际进口数仅为1860公担，这种转口贸易在珠江三角洲关口比较多见。

再者，香港和澳门并不种植槟榔，但仍有为数众多的槟榔出口。从《中国旧海关史料》统计数据看，港澳等地槟榔的来源地大致有二：一是从海南琼州关进口，1905年琼州海关出口槟榔12786公担，常关出口10043公担，其中60%以上都是出口往香港和澳门的，尤以香港为多，其次则是销往国内，而出口国外很少。二是由国外进口，在晚清民国时期，国内每年均会从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和英属印度等地进口数量不等的优质槟榔。港澳地区每年从上述国家进口大量的槟榔。这说明，港澳地区即为一个巨大的槟榔中转站，内地各关所需槟榔除直接通过各关之间的交易及从海南等地进口外，更多的是从港澳进口或通过港澳向国外间接进口。

表2 1905年各关进口槟榔数量（单位：公担）

| | | | | | | | | | | | |
|----|------|-----|-----|-----|------|------|------|-------|-------|-----|------|
| 关口 | 牛庄 | 芝罘 | 长沙 | 镇江 | 拱北 | 梧州 | 秦皇岛 | 重庆 | 汉口 | 上海 | 江门 |
| 数量 | 1997 | 840 | 787 | 275 | 7750 | 4823 | 219 | 1171 | 2240 | 720 | 1007 |
| 关口 | 天津 | 宜昌 | 九江 | 宁波 | 北海 | 汕头 | 广州 | 九龙 | 三水 | 腾越 | 其它 |
| 数量 | 3892 | 40 | 204 | 286 | 37 | 427 | 4689 | 15035 | 14509 | 229 | 3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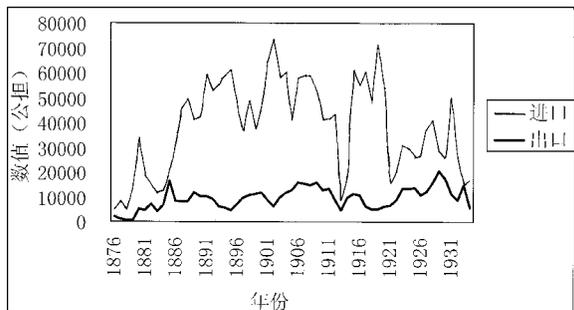


图6 晚清民国槟榔贸易额变化曲线

通过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在1905年，我国槟榔出口数远不及从国外进口数，虽然海南约有20000公担的槟榔出口，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槟榔市场的需求。事实上，

笔者通过对《中国旧海关史料》统计的各关每年进出口槟榔数量的分析后发现，晚清民国时期，槟榔贸易的总体趋势为进口多于出口（见图6）。其二，晚清民国虽时局动荡，但槟榔贸易多通过海关来进行，关卡林立，层层抽税阻碍了各常关之间的正常交易活动。第三，从表2来看，天津、汉口、牛庄及长沙关所进口的槟榔数量比较大，有的甚至比广州关还多，笔者认为，这些地方进口大量的槟榔，除了药用外，很大可能存在着嚼食槟榔的习俗，因而，有嚼食槟榔的地方并非仅限于岭南诸省份。

四 槟榔习俗的衰减

我国岭南居民嚼食槟榔之风气在明清两代十分浓厚，但到了民国，槟榔习俗呈现明显衰减之势。虽说有些地方槟榔仍为婚俗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也有不少酒楼用槟榔款待客人，但除了海南台湾和湖南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的槟榔嚼食习惯已开始慢慢淡去。这一点从民国时期的文章中就得到很好的证明，如：

我曾听过我的祖母说，伊曾经啖过许多的槟榔，又说我的父亲和伯父们都曾啖过不少，不但包冬瓜糕时才得到这些香福，就是平时也常把它来咀嚼着的。可见这种风俗，在我辈出世后，才渐渐变了呢。……当人们家里做好事而要告诉亲戚不必送贺礼时，常拿两个槟榔去送给亲戚，现在槟榔少了，已用橄榄来代替它了。^①

还有我们的故乡——翁源，在十多年前，啖槟榔的风俗还是很盛行，……是以现在还有许多人能够在旧书柜、衣箱、毛篮中，翻出几颗已经积蓄数十年之久的槟榔来。^②

槟榔习俗的衰减有个过程，近世在少数地方的遗风遗俗中仍可见其踪影，如东莞，据民国时人记载，当地的礼节上还保留了以前的习俗，即婚姻以染红槟榔当聘礼，在婚后，女亲戚家里还须馈赠槟榔一担给男家及其亲戚，这礼节被称作“担槟榔”；新婚满月，男家又须备槟榔一担送女家酬谢，名曰“酬槟榔”；甚至在祭祀鬼神中也用槟榔。这些槟榔习俗并不多见，故而被称作“槟榔遗俗”^③。

笔者认为，导致槟榔习俗衰减的最主要原因即是大多数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清代有了很大的改观，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岭南经过了无数代人的辛勤劳作之后，在清代已成为连接世界的窗口。随着和世界其它地方联系的加强，岭南居民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在古代的中医界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过分依赖槟榔的药用价值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如《岭外代答》就说：

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

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④

《黄瑜双槐岁抄》一书也说：

岭南地热，食槟榔故脏气疏泄，然一旦病瘴，当下则虚羸而本不能堪，所以土人多体瘠面黄，盖槟榔为患，习而不觉耳。^⑤

应该说，传统中医所揭示的问题正反映出人们对槟榔的认识在逐步发生改变。人们对槟榔以及与其伴嚼的葵叶的药用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槟榔与葵吐合嚼虽对防治寄生虫病、细菌性传染病有作用，但其功效远不及近现代的西药明显，如枸橼酸哌嗪、四咪唑之于蛔虫病、钩虫病，吡奎酮、呋喃丙胺、敌百虫三联之于血吸虫病，奎宁之于疟疾，青霉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之于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伤寒杆菌感染等有良好疗效，这是传统中药难于匹敌的^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岭南人吸烟喝茶的新嗜好成为时尚，这使得人们嚼食槟榔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有，嚼食槟榔因红色唾液随地乱吐有碍观瞻而历来为官宦文人所诟病，甚至在一些地方受到禁止。笔者2008年在海南五指山市大街上曾见到随地吐槟榔要被罚款的巨大横幅。由于这些因素，槟榔、葵叶的历史地位在逐步下降，咀嚼槟榔的习俗渐趋衰退。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国湖南、海南和台湾等地虽然仍有嚼食槟榔的习俗，而对槟榔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嚼食槟榔致癌或槟榔对水土保持不利等地说法广为流行，使槟榔业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但笔者认为，槟榔的药用价值并不能被完全抹杀，即使是作为嗜好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可供开发，特别是在向东南亚地区出口方面。

①云心：《关于啖槟榔的风俗》，《民俗》，第5期。

②清水：《关于啖槟榔的风俗之二》，《民俗》，第5期。

③容媛：《东莞遗俗上所用的槟榔》，《民俗》，第43期。

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食用门》。

⑤乾隆《广西通志》卷128《艺文》。

⑥郭声波：《蒟酱（葵叶）的历史与开发》，《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of The Betelnut Planting and Betelnut Custom Culture in China

Guo Shengbo, Liu XingLiang

(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betelnut was the tradition drugs and the hobby in our country, Its have glorious cultivation and chewing history in our country. However, the researching on this problem stii weak. This artic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re are distribution of the betelnut planting,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betelnut customs,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betelnut and the weaken of the betelnut customs from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gle to do further research this problem. Hope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ep research on Betelnut Planting and Betelnut Custom Culture .

Key words: Betelnut; Betelnut planting; Betelnut Customs

* * * * *

《读史方輿纪要》辨误一则

齐仁达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读史方輿纪要》卷14《北直五》定州“安喜废县”条有“后唐天成三年，成德帅王都据州叛”一语。（见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册第617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同。（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第599册第649页）其中“成德帅”一语误。

王都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取代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事见《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均王龙德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869页。据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5页，义武军节度使驻定州，领有易、定、祁等州。）至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据定州叛。（事见《资治通鉴》卷276，后唐纪五，明宗天成三年，第9017—9018页）在同一年，任成德军节度使者（据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第283—284页，成德军节度使驻镇州，领有镇、冀、深、赵等州）前为王建立，后为范延光。（见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第288页）在此前和此后的成德军节度使中也未见王都姓名。《旧五代史》记载后唐明宗削王都官职，只有“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太原王”。（见《旧五代史》卷39，明宗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38页）另外，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引《册府元龟》卷123作“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守定州刺史、太原郡王”。（见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39，唐书十五，明宗纪第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7页）

综上观之，王都以义武军节度使据定州叛，未尝领有镇州成德军。《读史方輿纪要》卷14《北直五》记载真定府（真定府在唐五代时，或设恒州，或改镇州，或升真定府，均治今河北正定）设成德军，或改武顺军，或改顺国军，记载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建中二年义武军节度使治于此。五代因之。”可见顾祖禹并没有把成德军驻地和义武军驻地相混淆。“安喜废县”一条“成德帅王都”当是一时之笔误，当改曰“义武帅王都”。